

老烟台餐饮业的逸闻琐事

□郝祖涛



芝罘俱乐部旧址。冷永超 绘

餐饮业是直接面向大众的服务行业,鱼龙混杂,就像大染缸似的,演绎着人间百态和悲欢喜乐。老烟台餐饮业旧年的那些逸闻琐事,恰如戏剧中的桥段,成为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缩影。

假冒伙伙骗黄酒

餐饮消费的买卖双方、原材料的供需双方,以诚信互惠为基础订立的“挂账”制度,体现了生产经营活动的契约精神。对各方而言,这种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加彼此信任,密切业务关系,降低结算频次,提高资金效益。

当然,任何规章制度都有疏漏之处,这也成为招摇撞骗之流常钻的空子。上世纪80年代末,烟台一家有名的饭店,仅宴请餐费就被骗近两万元。

这类骗术并非现代社会产物,解放前就有。民国《东海日报》就曾以《冒名叫酒图骗其壶》为题,报道了烟台街一起“巧骗”黄酒的案例。1933年1月10日,该报记者途经正阳街饭馆正阳楼时,闻听楼内柜台处有多人的争吵之声,出于好奇询问原因,原来是与酒楼有“照账”关系的某黄酒馆,春节前依约派人前来结账,但双方对其中一笔黄酒生意产生分歧。据黄酒馆的相伙(即站柜台的服务员)讲,这之前曾应正阳楼座客之召,送来两壶黄酒,快到该楼门前,却被人凭空接去。此人抱怨送得太晚,耽误客人宴饮,即携酒而去。送酒的伙计以为接酒人是该酒楼的相伙,谁知结账时,正阳楼司账声称并无此座客,遂发生争吵。恰巧在争执未果之时,有位会英楼的相伙行经此处,告知会英楼日前亦曾发生过同样骗局。至此双方恍然大悟,敢情是有人冒名骗酒,黄酒馆只好自认倒霉。

封存厨刀有缘故

厨刀对于厨师来说,就像武器对于士兵一样重要。作为墩上师傅的吃饭家伙,厨刀日常都是专刀专人专用,餐馆打烊后由个人或徒弟分散保管。但其毕竟是利器,用处不同性质也就变了。民国年间,烟台街曾发生过一起轰动商埠的厨师杀人案,作为凶器的厨刀一度成为集中“封存”的严管工具。

1933年12月25日夜間,位于会英街义和馆的临街门面房内,发生了一起骇人的惨杀案,四名主仆中有两人当场惨死,两人重伤命危(送医后一人不治身亡)。后经法院检验,死亡的副执事周某山身中30余刀(头部被砍下),柳某德、孙某福两人头部均中6刀,而经医治获救的王某山也有6处较轻的刀伤。惨案发生后,警局派出得力探员限期破案。经过曲折的侦查追捕,1934年2月28日,凶手张某荣在福山龙口村(今福山隆口村)被捉获。因为案情重大,省府主席韩复榘在济南办公室内亲讯详审,张犯直认杀人不讳,于3月12日以预谋杀及越狱两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供词显示,张某荣是福山县人,擅长抻面条、包饺子,与死者之一的周某山原为另一家餐馆的同事。1933年10月底,周某山被新开业的义和馆聘为副执事后,觊觎张某荣独特的面食制作技术,允以高薪好处力邀其跳槽。张某荣到义和馆后,仅工作13天,手艺秘方即遭“徒弟”偷学,随后被周某山设计辞退。其后,又因对方违约扣工资小账、恶语中伤、完工可做以个人存放店内的衣服丢失等,张某荣骤生仇恨,案发当晚叫门进入义和馆,以周某山为首要报复目标,连带阻拦的三名伙计,用灶间厨刀犯下这起惊天凶杀惨案。

此案发生后,烟台街的大小餐馆皆有警惕之心,警察局则严令饭馆业者每晚关门后,由各家执事将每日应用刀类如数检齐,交给司账者藏于柜内加锁“封存”,以防发生意外。其后,每日集中保管厨刀,成为各饭馆必须要做的事项。

执事欠债忙跑路

在清末民国时期,老烟台餐饮业的组织形式产生了三种新形态,其中的“委托经营型”颇具超前意识,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旧时,委托经营被称为隐名合伙,即通过有实力的隐名合伙人出资,由出名营业人代为经营,并按合同约定分享营业利润,承担亏损责任。

当年烟台街隐名合伙的餐企有很多,如大罗天、东坡楼、义和馆、中兴楼等。资方聘任的出名营业人亦即现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官称执事,俗称管事,后来称为经理。规模较大的餐企,除了聘任一名执事外,有的还配备一名副执事,一方面协助执事开展经营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起到权力制衡与监督作用。

执事作为被委托人,核心要求是懂经营、会管理,能够实现委托者资产增值、效益提高、运营稳定的目标。老烟台这类成功的事例并不鲜见,如1939年4月13日开业的中兴楼饭店,就聘请阅历经验丰富的钟毓理为职业经理,其连续任职时间长达10年,在变化动荡的年代一举将中兴楼打造为烟台街的餐饮名店,本人1950年初还荣任烟台饭店业分会主任委员。

然而,并非每个职业经理都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其中不乏一无所成、两败俱伤甚至避债潜逃之流。1933年《东海日报》曾经报道,西马路福兴园饭馆执事盛某海,因“生意赔累”,面对巨额经济损失和个人赔偿,竟然“潜逃无踪”。出资人及众债权人无奈议决,将该铺底及账目兑与赵某山另行开张。

委托经营这种组织形式,古今都有实践探索,体现了专业化管理和契约化精神。作为职业经理人选,只有具备综合素质能力,才能实现出资人、经理人双赢的结果。

住店老外频繁肇事

1861年烟台开埠后,入境的外国人日渐增多,1897年前成为山东境内居住外国人的最多的城市。据海关记载,在各国领事馆注册的外国人,到1916年时已由1882年的250人增至1306人,国籍包括英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

这些驻留烟台的外国人身份多样,有领事馆官员、贸易商人、传教士以及本土企业外聘技师,还有阶段性逗留的商旅客、度夏客和办差人员。除长期公务经商者设有固定寓所外,绝大多数都选择租住商务酒店。为满足西方人的居住需要,自1865年起,资本雄厚的中外商人先后在烟台海岸路周边,陆续兴建了海滨饭店、利顺德饭店、大陆饭店、求四饭店、青记饭店等食宿兼营的服务设施,作为西方人及国内上流权贵的接待场所。

民国时期老烟台的“涉外”饭店,住客来自各国,相互间吵架斗殴的情况司空见惯。1935年6月25日凌晨4时许,居住在烟台大有饭店的两名外国人,就发生了激烈争吵。当事方一位是德籍鲍姆戛特纳(O.A.Baumgartner),受聘担任烟台生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长年租住在大有饭店;另一位是美籍巨富商人,因生意之事来到烟台,短期租住在大有饭店。盛夏的烟台属于旅游旺季,事发之时又在寂静的凌晨,熟睡的住客突然被高亢的争吵声惊醒,那种恼怒心情可想而知。在双方争吵不休、店客遭责之下,两人“扭赴”警局第一分局驻所,经警员于叔印调解无效,又扭往美国领事馆,后续未知结果如何。

而同在1935年发生在俄籍住客身上的一件事,用可恶至极形容当不为过。民国时期居于烟台街坤山路的青记饭店,也属于“涉外”饭店。有一位名叫利利的俄罗斯籍住客,长时居住于此,因拖欠房租甚多“延不缴纳”,9月7日饭店执事张锡相与之理论,不料该住客勃然大怒,当场将张某眼睛打伤,双方遂“扭赴”警局处理。分局刘局长以该案严重未便受理,“当令彼等赴法院起诉”。

这类事件表明,向来标榜平等、人权、法治“普世价值”的部分西方人,其素质德行也不过如此。

无情火灾毁商铺

俗话说,水火无情。不论哪种类型的建筑,任何疏忽大意都有可能引发重大灾祸,古今概无例外。民国时期烟台街见诸报端的两起涉及餐企的火灾,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始建于开埠初期的广东街,属于清末以来烟台重要的商业区域之一。这条街的南首路东有一处楼房,合计30余间房屋,系坤西舒家村曲某所有,经由二房东分赁给6家业户作为经营场所,包括餐饮食店源顺馆、益隆福等,其中的常餐某馆源顺馆约开设于1913年前,是烟台街的一家老店,“生意颇称不恶”。1933年12月20日凌晨3点钟许,该楼突发大火,将6家

店铺在内的全部楼房尽数烧毁,及消防队赶到猛力扑救始告平息。大火造成的惨状,《东海日报》以《全部楼房化为焦土》为题概述,各商号经济损失更是“颇为不赏”无法计量。

约于1880年兴建的正阳街,也是餐企比较集中的街道。1939年7月23日下午6时许,南首路西之天华饭馆“突然失慎”发生火灾,中央警署的官警皆出动,在火场附近各街路口警戒,禁止任何行人通行。消防队驰往施救,附近拉水车也前往帮忙,具体经济损失不明。

民国时期,商家做生意的经营场地,打烊后多用作伙计的宿舍。源顺馆等店铺凌晨发生火灾时,应是店铺伙计深度熟睡阶段,全部楼房短时“化为焦土”,各商号伙计居然安然无恙,简直不可思议。而天华饭馆遭遇火灾之时,恰是该馆“新近创筹”之际。东家王仁厚于1939年7月1日盘下原名永乐春和记的这家餐馆,计划稍加修整后于月底开业,不想仅过20余天就突遭火灾,对忌讳讲究颇多的商家而言,可谓出师不利。

主仆自杀为哪般

20世纪30年代的烟台街,媒体曾报道过相距不远的两家餐企人员自杀的新闻,这当中既有宴乐斋饭馆的经理,又有大罗天菜馆的伙计,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

自杀的餐企经理叫张某臣,1935年6月19日在会英街上开设宴乐斋饭馆。他重资特聘“超等厨师”主持厨务,精制各种烹调得法、味美适口、合于卫生的美食佳肴。尤其是主管的“坛肉”菜品久享盛誉,成为时年烟台街经营此味的四家特色食店之一。1936年4月下旬,在饭馆开办尚不足年时,因与保德医院医士胡某正“秽褻纠葛”,张某臣不堪其辱“羞愤自杀”。事件发生后,警局将胡某正及其子“传案押候侦讯”,并将裁决结果公诸报端。张某臣之妻林氏则以“张死不明冤抑莫伸”为由,于4月25日率其子到警局喊冤,警局判定该案属司法范围,当即移送法院依法审讯。

另一个自杀的餐企伙计叫杨某宾,来自福山农村的贫困家庭,在大罗天菜馆站柜司账,时年只有20岁。1933年4月3日下午1时许,菜馆正处于众客集中退堂的时段,杨某宾忽服颇具毒性的“信石一包以图自尽”,幸好被同柜伙计及早发现,当即送至福民医院救治,期望挽回生命。至于自杀原因,疑似当日中午客多满堂,有食客趁乱恶意逃单,杨某宾恐惧担责赔偿,导致精神崩溃。至于毒物信石之来源、医院抢救之结果,未见媒体报道。

拾遗巨款馈食客

见利思义是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之一,不仅在当下赓续传承,在民国时期也有体现。源顺馆伙计拾遗巨款归还失主的举动,就是其中之一例。

1933年12月20日,因火灾损毁的餐饮老店源顺馆,依赖永兴承保公司2000元的火险理赔,对旧处进行5个多月的建筑装修后,于此年的5月14日重新开业,照旧经营饭馆生意,买卖红火如前。1935年1月31日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七日,这天下午,福山县旺远村的刘某芝,因年前偿还债务急需款,专门到烟台街“取地价洋九十元”。当晚7时,饥肠辘辘的刘某芝来到源顺馆,点了壶老烧及菜饭,酌后微带酒意立马启程返家,误将90元法币“遗于该号桌上”,被收拾餐桌的堂倌林之田拾起。林之田立即送交执事刘子明,并言明系座客所遗。刘执事即刻“揭帖招领”。而刘某芝发现丢钱之后,沿途寻找,突见“招贴”启事,始想起遗在该饭馆内,遂觅受寰海商行担保,分毫未差地由该饭馆领出。失主“以五元作酬”,堂倌林之田“坚辞不受”,刘某芝感慨万分。

1935年改革初期的法币,面值等同于大洋。按平均购买力测算,食客刘某芝的“遗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两万多元,称为“巨款”当不为过。要知道,那时候烟台的“鱼翅席”约需8个大洋,上等饭馆宴客的“四菜一汤”也就2个大洋。

“遗洋”失而复得后,刘某芝基于源顺馆执事和伙计见利思义的善举,特地告于报纸宣传褒扬。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烟台街发生的这些事例,可谓五味杂陈、悲喜交加,既有警示性的恶行,又有褒扬性的善举,是老烟台餐饮业真实的写照,对当下的餐饮人而言或许是一种启迪。

1942年,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寒夜漫过胶东大地。全国军民浴血抗敌的声势,如星火燎原燃遍山河。日伪军在节节败退的颓势中,撕下伪装,祭出“蚕食”“大扫荡”的毒计,于乡野间四处围捕抗日力量,妄图扼杀这股蓬勃的抗争之火。

彼时,招远西曲城村的锄奸团,是乡土间坚韧的抗日星火。发起人杨之君壮烈捐躯后,革命火种并未熄灭,反而在百姓的托举下愈燃愈旺。杨文盛作为团中骨干,依旧奔走于村落之间,传递情报、组织抗敌,将一腔热血尽数洒在保家卫国的路上。

一日拂晓,雾气裹着寒意笼罩村庄,日伪军突袭西曲城村,直扑锄奸团驻地。杨文盛被敌军紧追,一路拐弯抹角,最终躲进自家的栏厰之中。栏墙不高,却能从缝隙处窥见外面的动静。他攥紧拳头,心跳与远处的枪声同频。待日伪军走近,他翻墙进入东邻杨全盛家。杨全盛早年闯关东,家中只剩妻子于典英带着四个孩子(长子是哑巴)艰难度日。

杨文盛进门时,孩子们正围坐着吃饭。他迅速坐下,端起碗筷,轻声叮嘱孩子们:“待会鬼子进来,就说我是你们的爹。”孩子们懵懂点头,依旧安静吃饭,没有丝毫慌乱。

片刻后,两个日本兵与两个日伪军闯了进来,枪栓拉得刺耳。日伪军指着杨文盛问孩子们:“他是你们什么人?”

三个孩子异口同声回答:“他是俺爹!”

日本兵端详片刻,见孩子们神色坦然,无半分破绽,便嘟囔着退了出去。一场生死危机,终是有惊无险。那四个稚童临危不惧的模样,印证着华夏儿女骨子里的坚韧,支撑着中华民族在风雨中屹立不倒。

时光流转至1963年冬,招远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蚕子人民公社党委召集全公社的党员干部,于公社驻地集中学习。大家白日听报告,夜晚分片讨论至深夜,困了就睡在东岭修配厂的大通铺。闲暇时,大家凑在一起聊往事,一段尘封的英雄往事,在夜色中被缓缓讲述。

1941年8月8日,杨之君被捕后,日伪军对锄奸团恨之入骨,接连策划偷袭行动,抓捕领导人王茂盛。

一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东曲城村“狮子口”的高台场院上,16岁的民兵杨法盛正持枪站岗。连续值守大半宿,他困乏难耐,却依旧坚守岗位,警惕着四周的动静。

这时,南岭方向悄然袭来一队日伪军,迅速将他包围。一个汉奸恶狠狠地说道:“快带路,去李格庄村王茂盛家!”

杨法盛年少却有傲骨,沉声道:“我是东曲城村人,不认识王茂盛。”

“还敢嘴犟!”汉奸抬起枪托猛砸他,厉声威胁,“不走就捅死你!”

杨法盛被连推带打,朝着李格庄村方向走去。他心中明镜似的,王茂盛的家就在村子的西南角,几步之遥。若真带鬼子前去,王茂盛必遭抓捕,自己便成了千古罪人。

“宁死不当叛徒!”这个念头在他心中生根发芽。行至李格庄村西头时,他趁鬼子不备,扯开嗓子拼命高喊:“王茂盛快跑啊!”

喊声穿透晨雾,在村庄上空回荡。日伪军这才反应过来,他是在报信!他们恼羞成怒,朝着杨法盛的后腰连捅三刀。

杨法盛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之中,昏死过去。此时,王茂盛刚穿好衣裳,听到远处的呼喊声,他心头一紧,却已来不及外逃。他迅速翻过东墙,躲进寡居的街坊大婶家中。

“大婶,我躲到顶棚的麦秸草里。鬼子问起来,您就说没见过我。”王茂盛说完,踩着饭桌爬上顶棚,用麦秸掩盖住身形。

大婶镇定自若,挪开饭桌,继续烧火做饭。

很快,两个汉奸闯了进来,厉声喝问:“刚才的人藏哪了?”

大婶不慌不忙:“我刚起来做饭,就我一个孤寡老人,没人来过。”

汉奸里外搜查一遍,其中一个踏上饭桌,举枪朝顶棚捅了几下,见无异常,便转身离去。

待村里恢复平静,百姓走出家门,发现村头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王茂盛上前辨认,发现是杨法盛,急忙招呼人将他抬回家,请来老乡医救治。医生检查后说:“万幸伤在后腰,未及要害,养些日子便可痊愈。”

经此一劫,王茂盛深知留在故乡已不安全,便毅然报名参军,从县大队逐步进入正规部队,奔赴更广阔的抗日前线。而16岁的杨法盛以少年之躯舍身报信,救乡亲于危难,其义举感动乡里,成为流传至今的佳话。

华夏儿女,自古多壮志。烽火岁月里,有杨法盛这般的平民义士,以血肉之躯守护同胞;有稚童临危不惧,以纯真守护信仰;有王茂盛这般的革命者,舍家为国,奔赴前线。他们之间,有着鱼水相依的深情,有着同仇敌忾的民族大义,更有着保家卫国的铮铮铁骨。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汇聚成民族抗争的磅礴洪流,抵御外侮,守护家园,终迎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正是——华夏儿女多壮志,舍身相救鱼水情;同仇敌忾民族恨,保家卫国永流芳。

征稿启事

烟台既是沿海开放城市也是革命老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丰富。为更好地发掘烟台的文化元素,本报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您所知道的发生在烟台以及元素烟台相关的事件、人物、故事等稿件,要求稿件内容真实、准确、严谨,可读性强、故事性强,且有据可循。同时,本报还面向读者征集老照片,听您讲述那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投稿邮箱:ytrbzk@126.com

世人皆知,陶渊明归隐浔阳柴桑、南山种菊,为后世留下最清逸的田园情愫,却少有人知,那一缕拂过五柳柴门的千载清风,终渡江北上,落驻渤海之滨的登州古壤,萦绕在登州蓬莱西北蔚阳山的崖壁河滩之间。

近日翻阅《蓬莱蔚阳山陶氏祖谱》,见谱中所载陶氏远承隋唐,脉出陶侃、陶渊明,心底倏生悠远之思。历史最是温柔亦最巧妙,将千古隐逸的斯文清气,悄悄安放在登州这片海防重镇、边海烟火之地。据谱牒所载,明洪武年间,陶氏一世祖陶明福随军戍守登州,以文才受誉“翰墨文章第一家”,自此自籍蓬莱,世代扎根。清康熙年间,蔚阳山始迁祖陶诗,复自城内迁居蔚阳山北麓,爱其前山后谷、河水长流的清幽地势,结庐垦田、安家立宗,至今已绵延一十八世。

一纸旧谱,淡淡落笔,却笃定百年史实:蓬莱蔚阳山陶氏,为陶渊明文脉后裔。

若靖节先生穿越千山万海,驻足蓬莱水域画桥,看古邑西大街店铺窄巷、车马相让。望街前街陶氏祠堂素简清幽,定然会生出古今恍隔的怅然。此地无“万宅十余亩,草屋八九

浔阳月落登州海

□蔡玉臻

间”的悠然田园,唯有边海重镇的苍峻风骨。

登州自古为京东锁钥、海防咽喉,从来不是避世归隐的南山丘壑。蓬莱陶氏先人,无缘栖居桃源、东篱采菊,只于蔚阳山翠壁青崖之下,耕读立世、守土传家,把临山滨海的烟火岁月,活成了另一种沉静诗意。

根据族谱记载,蔚阳山先祖陶诗,承祖传文脉,耕读之余,雅擅诗画,曾题诗村后崖壁,笔墨清古:

翠壁悬崖傍水涯,环山老树共槎芽。
扁舟独自乘流往,欲觅前村卖酒家。

诗句疏淡清远,尽得靖节先生遗韵,却又褪去江南柔婉,浸满胶东山海的苍劲质朴。浔阳的月,是归隐山林、随心自在的恬淡;蔚阳山的酒,是面朝沧海、安守故土的从容。

米折腰”的清高气节;一脉是登州忠贞,是临危赴义、济世安邦的家国担当。陶渊明以归隐成全文人情操,守一身清白悠然;陶明先以热血践行士人初心,担一世山海安危。一隐一仕,一柔一刚,恰是陶家文脉跨越千年的双向成全。

今至蔚阳山北麓陶氏一脉,村野老者仍能细数陶家旧事。古谱泛黄、崖诗漫漶,岁月磨去笔墨痕迹,却磨不散世代相传的宗族家风。凝望蓬莱古城旧影,鼓楼幽深、古街深沉,旧坊矗立街巷之间,于寻常烟火里撑起一城文脉底色。我突然明白:虽然陶渊明终生未至登州,可他的文脉余风,早已随陶氏后人落户渤海之滨。江南五柳的隐逸清气,落入北方海疆的沧溟碧波,在军屯渔耕的岁月缝隙中,生根发芽,长成为独属于蓬莱的别样的海派桃源。

浔阳月落,千古隐逸风流尽;登州潮生,百年宗族文脉长。

五柳庄的东篱菊香,终有岁岁枯荣;而蔚阳山古树槎芽之间,蓬莱陶氏的根脉家风,千载绵延、生生不息。一怀归隐之清,一身济世之重,在登州山海之间相融相契,凝成一声沉静悠远的历史回响,耐人细品,亦值得长久留存。